

地方书写的多主题呈现 ——以苏门文人的浯溪留题为中心

彭敏

(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 湖南永州, 425000)

摘要: 苏门文人张耒、秦观、黄庭坚曾先后题咏湖南永州的浯溪, 集中表现了浯溪地方书写的多主题性。苏门文人的题刻首先体现了浯溪的传统人文主题, 包括忠义颂德、怀古追贤、遁世隐逸等, 其特点是将自我贬谪身世融入浯溪地方书写当中。其中黄庭坚的《书摩崖碑后》发出史评新声, 认为元结《大唐中兴颂》语涉讥讽, 引发了后世文人在浯溪石刻上的激烈争论, 开辟了浯溪史论新主题。此外, 苏门诸人留题浯溪虽非同时, 但他们的作品之间互有勾连, 表达出深厚的师友情谊, 形成了苏门文人内部在浯溪特有的“友情”主题。

关键词: 浯溪; 石刻; 黄庭坚; 秦观; 张耒

中图分类号: I22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7)01-0142-06

浯溪在湖南的永州, 因中唐元结的《大唐中兴颂》与“三吾铭”等石刻名闻天下。历代文人纷至留题, 形成了“满山皆字, 无石不诗”的奇异碑林文化景观。浯溪的宋代碑刻很多, 据统计, 浯溪宋代碑刻多达167通, 其中诗刻71通。这些石刻以苏门中人黄庭坚、秦观、张耒三人的留题最为夺目。他们的生平经历与文学主张有很大的相似性, 且不同程度地都与浯溪产生了联系, 而他们在浯溪的书写虽然主题多元, 内容却彼此呼应关联。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让他们成为浯溪众多留题者中一个独特的群体, 以他们的创作来探讨浯溪地域书写中的多主题性, 最具代表性意义。

一、传统主题呈现: 忠义颂德 与怀古追贤

浯溪唐碑30余通, 现存17通, 其中包括元结的3铭1颂。元结《大唐中兴颂》的主题是忠义颂德, 包括斥贼叛乱、颂主复国等内涵;《浯溪铭》《岷台铭》《唐虞铭》的主题是隐逸, 包括亲近水石、忘情自适等内涵。元结之后的浯溪唐碑除了对以上两个主题的继承外, 又多出一个怀古追贤的主题, 其内涵包括对元结古文与事迹的阐发品评。发展至宋代, 因为《大唐中兴颂》碑由颜真卿书写, 颜真卿的书法也受到相应关注。总之, 由唐至北宋前期, 忠义颂德、怀古追

贤、隐逸三题并行于浯溪, 成为浯溪诗文经典的传统主题。

张耒的浯溪诗刻《读中兴碑》主要是围绕浯溪的传统主题展开的。诗曰:

玉环妖血无人扫, 渔阳马厌长安草。潼关战骨高于山, 万里君王蜀中老。金戈铁马从西来, 郭公慷慨英雄才。举旗为风偃为雨, 洒扫九庙无尘埃。元功高名谁与纪, 风雅不继骚人死。水部胸中星斗文, 太师笔下龙蛇字。天遣二子传将来, 高山十丈磨苍崖。谁持此碑入我室? 使我一见昏眸开。百年废兴增叹慨, 当时数子今安在? 君不见荒凉浯水弃不收, 时有游人打碑卖。^{[1](5470)}

据《苕溪渔隐丛话》, 胡仔曾亲见此诗石刻, 诗前有作者“张耒文潜”, 后有题款“秦观少游书”。^{[2](323)}张耒并未亲至浯溪, 不过“谁持此碑入我室? 使我一见昏眸开”两句, 可证张耒乃观石碑拓片作了此诗, 而由落款则知这首诗是由秦观代张耒手书上石。

关于诗歌的主题与内涵。《读中兴碑》前四句写唐玄宗因女色招致大患而奔蜀的史事, 突出玄宗从权力高峰坠落的人生无常, 可谓之悲君王; 五至八句写郭子仪等将领用兵作战英武神勇, 平定安史之乱恢复唐室江山, 可谓之颂忠义; 九至十六句写元结、颜真卿为之作颂书于崖壁永纪中兴之功, 及诗人看到颂碑拓本时惊喜的感受, 可谓之赞元颜; 诗最后四句话锋一

收稿日期: 2016-06-25; 修回日期: 2016-09-1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湖南石刻文献著录与研究”(15YJA870007)

作者简介: 彭敏(1987-), 女, 湖南衡山人, 文学博士, 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古代文学

转，感叹历史之兴废，颂碑之荒凉，可谓之悲历史。从人生幻灭至中兴繁荣，至元颜赞颂，最终又归至历史幻灭，全诗架构恢宏大气而情感一波三折，其总体基调是悲凉的。而在这种悲凉感当中，忠义颂德与品评元颜先贤两大传统主题交织并行。不过，张耒诗的颂德与元结中兴碑的颂德已有不同，元结所颂乃二圣之君德，而张耒所颂乃郭将军与元、颜三人的臣德，其中已经透露出后来黄庭坚发出史评新声的讯息。

在浯溪书写当中，诗歌的多主题性体现在不同文人的不同作品中。如黄庭坚《书磨崖碑后》同样以中兴颂碑为题，其议论主题却与张耒的《读中兴颂》迥异。同时，浯溪诗歌的多主题性也体现在同一作品中。经过数百年的诗意积累，“浯溪”这个词本身就承载着不同指向的丰富内涵，每一种内涵指向都可以是诗歌创作的主题。然而诗人在实际创作当中，不一定只选取一种内涵进行吟咏，而常常是将多种内涵同时呈现在诗歌当中，这就形成了同一首诗中多主题的存在，如张耒《读中兴颂》一诗，就融入了忠义颂德与怀古追贤这两种浯溪的经典人文主题。

二、旧主题中自我身世的并入： 党祸之恶与隐逸之心

绍圣三年(1096)冬，秦观泊舟浯溪，亲瞻中兴颂碑，除了将张耒的《读中兴颂》手书上石之外，另外自有抒怀，诗曰《漫郎》。不过秦观为何不刻石自己的诗歌，而是刊刻张耒之诗呢？这大概与其早前经历相关。《淮海先生年谱》载：

绍圣三年丙子，先生年四十八。先生在处州，既罢职，乃修忏于法海寺，因题壁云：“绍圣元年，观自国史编修官，蒙恩除馆阁校勘通判杭州道，贬处州管库三年，以不职罢，将自请田以归，因往山寺中修忏，日书绝句于住僧房壁。云：“寒食山川百鸟喧，春风花雨暗川原。因循移病依香火，写得弥陀七万言。”先是使者承望风指，候伺过失，卒无所得，至是，遂以谒告写佛书为罪，削秩徙郴州。^{[3](31)}

朝堂小人对元祐诸臣迫害的无耻卑劣程度丝毫不逊色于早年的“乌台诗案”，而无孔不入的探报使者也让人感到惶恐。秦观因题诗僧壁而被冠以写佛书这样莫须有的罪名，让他事后仍心存余悸，绝不敢再在贬途中赋诗题壁了。也正因如此，当他途经浯溪心有所感之时，唯有题写好友张耒之诗来表白心迹。

这种对党祸的畏惧在秦观自己的诗歌当中也有体现，其《漫郎》云：

元公机鉴天所高，中兴诸彦非其曹。自呼漫郎示真率，日与聱叟为嬉遨。是时妖星殒未久，关辅扰扰犹弓刀。百里不闻易五穀，三士空传杀二桃。心知不得载行事，俛首刻意追风骚。字皆华星章对月，漏泄元气烦挥毫。猗玕春深茂花竹，九疑日暮鸣哀猱。红颜白骨付清醮，一官于我真鸿毛。乃知达人妙如水，浊清显晦惟所遭。无时有禄亦可隐，何必龛岩遁遁逃。^{[4](64)}

秦观此诗见于其别集，诗题下自注“分韵得桃字”，即知是与众人唱酬之作。浯溪石上不见此诗，历代文献中亦不见其诗上石记载，可知此诗并未刻石。《漫郎》一诗论史轻浅，持论亦是传统的主流观点，而第九句直言“心知不能载行事”，提醒自己谨言慎行，其小心翼翼的态度表露无遗。然而即便是这样一首很“纯粹”的与政治无关的诗歌，秦观亦未曾将之上石，足见他对当权者捕风捉影的卑劣打击手段的深刻畏惧。

畏祸之心往往很容易引发诗人思归山林之意，尤其在浯溪这样一个先贤曾发出“吾欲求退，将老兹地”^{[5](151)}之声的隐逸传统由来已久的地方。秦观的《漫郎》其实主要是以隐逸为主题展开的，诗首四句谓元结天赋极高非中兴诸臣可比，而元结又天真率性，以漫郎、聱叟之名嬉游自得于天地之间。“是时妖星”以下四句略谈历史，于唐史只蜻蜓点水稍提即休，而以历史典故来暗示良臣功绩未必能得久传，显示出对功名利禄的淡漠。此后四句称颂元文颜书，后八句又回至元结之漫性隐逸。“猗玕”洞乃兵乱起时元结举家避乱之所，元结后因之自号“猗玕子”，“九疑”即九疑山，在道州，是元结两任刺史之所。两地皆风景绝胜，元结在此两地的身份虽是一隐一官，然而其状态却皆似是隐，故说“一官于我真鸿毛”“无时有禄亦可隐”。在秦观看来，元结所实践的隐逸其实与出世入世关系不大，其关键在于心态之持平。“乃知达人妙如水，浊清显晦惟所遭”二句所言即是人生当如水质一般随物赋形，不随外物之变化遭遇而改变内心的平衡。从诗中涵义来看，可以说内心敏感脆弱的秦观在元结这里找到了一种保持生命平静的秘方。

秦观畏祸如斯，以致向隐，黄庭坚又何尝不是如此。绍圣三年秦观惨遭一再追贬而遣怀于诗，八年之后黄庭坚亦因文字获罪过浯溪，留题颇多。在苏门黄、秦、张三人当中，以黄庭坚居留浯溪的时间最久，留题浯溪的石刻最多，名气最大，其对开创浯溪书写主题的影响亦最深远。

崇宁三年(1104年)三月，黄庭坚在赴广西宜州贬所途中经停浯溪多日，留下了并序诗《书磨崖碑后》一首、题记一则、元结《欸乃》曲二首、陶渊明诗四

首,途中所作,不可谓不多矣。对于其贬谪宜州之事,史载:

庭坚在河北与赵挺之有微隙,挺之执政,转运判官陈举承风旨,上其所作《荆南承天院记》,指为幸灾,复除名,羈管宜州。^{[6](13110)}

事实上《荆南承天院记》其文只是议论寺庙修建耗费过多,进而抒发对百姓困苦生活的同情,倡“王者之刑赏以治其外,佛者之祸福以治其内”^{[7](1488)},本质上是利国利民之论,却被指“谤国幸灾”而降罪,这种诬陷迫害的可怕怎能不让人胆寒心栗?

又王明清《挥麈后录》“黄鲁直浯溪碑曾公衮下欲书姓名”条载:

崇宁三年黄太史鲁直窜宜州,携家南行,泊于零陵,独赴贬所。是时外祖曾空青坐钩党先徙是郡,太史留连逾月,极其欢洽,相予酬唱,如《江榭书事》之类是也。帅游浯溪,观中兴碑,太史赋诗,书姓名于诗左,外祖急止之云:“公诗文一出,即日传播。某方为流人,岂可出郊?公又远徙,蔡元长当轴,岂可不过为之防邪!”太史从之,但诗中云“亦有文士相追随”,盖为外祖而设。^{[8](170)}

曾空青,即曾纮,字公衮,曾布之子。《挥麈录》的著者王明清,字仲言,乃曾纮外孙,故文中称其为外祖。崇宁三年(1104年),曾纮亦因入元祐党籍而贬在永州,黄庭坚来时,二人相见甚欢,盘桓一月,结伴同游,多有酬唱。游浯溪时,黄庭坚应众人之请作《书磨崖碑后》,将二人名字书于诗末,曾空青急忙从旁提醒:二人皆是戴罪遭贬之人,岂可出游作诗?此诗若传到当政者蔡京的耳中,恐怕又要招来罪患。黄庭坚闻此,只好作罢。虽远在湘南鄙地,对政敌迫害的恐惧仍让流人有如惊弓之鸟一般,时刻都需小心谨慎,如履薄冰。也正因此,黄庭坚的这首诗并未即时上石,直到黄庭坚去世多年之后,才由他人出私钱刻于中兴颂碑左侧,使之广见于世人。

黄庭坚性格沉潜而坚韧,史载其向来“泊然,不以迁谪介意”^{[6](13110)},不过细读其浯溪留题,则可窥见他的避祸思隐之心。对于黄庭坚而言,包括题记与元结、陶渊明诗在内的三种刻石,都是对元结出世隐逸的呼应。元结父亲元延祖,弃官居于商馀山,史载其年长不仕,既仕又弃,并称“人生衣食,可适饥饱,不宜复有所须”,自躬耕于野。及至安禄山反,然诫元结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树名节,无近羞辱。”^{[9](4681-4685)}元延祖这种无事则安于山林有事则起而报君的思想为元结所继承。元结少时随父“习

静”于商馀山,安史之乱起,元结奋然而出,立下汗马功劳,平乱之后,代宗即位,“节使留后者例加封邑,君(元结)逊让不受,遂归养亲”,国危则出、国安则隐的行动准则正是对其父思想的继承。“岁余,上以君居贫,起家为道州刺史”^{[10](106)},而当时道州“为西原贼所陷”,因此元结再次赴任,自此两任道州刺史,在湘南前后居留八年。寓湘期间,元结曾五过浯溪,爱其水石异胜,去官之时亦结庐居于浯溪之畔,特好寻访山水以名之。元结之隐非道家之隐,乃儒家之隐。黄庭坚对这种隐逸是钦服的,故而题记称:

余与陶介石绕浯溪寻元次山遗迹,如《中兴颂》《岷台铭》《右堂铭》,皆众所共知也。与介石徘徊其下,想见其人,实探千载尚友之心,最后于~~浯~~亭东崖,披翦榛秽,得次山铭刻数百字,皆江华令瞿令问玉筋篆,笔画深稳,优于《岷台铭》也。故书遗长老新公,俾刻之崖壁,以遗后人。山谷老人书。^{[1](5465)}

黄庭坚“披翦榛秽”,找寻元子遗迹,所得最早是由江华令瞿令问所书之玉筋篆《浯溪铭》,黄庭坚遗文作书,俾人刻石,将元结此铭发明于世,实是出于对元结伴居山林、制字名之、“旌吾独有”的隐逸思想的钦羨。然而只此仍是不够,故又将元结诗歌《欵乃曲》二首刻于崖壁。《欵乃曲》本湘中渔父民歌,元结作之,是以渔隐自比,黄庭坚刻之,则是彰显元结之隐。黄庭坚因元祐党事,半生以来屡遭迫害,颠沛流离于途中,莫论高居庙堂,连自身性命尚且常常堪忧,当其流连于先贤隐居之地时,不免心生感慨,而通过这种书写,黄庭坚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内心的安宁。

黄庭坚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不仅表现在其题写元结《欵乃曲》上,而且他在浯溪嘉会亭刻石陶渊明的四首诗歌亦是此意。四首陶诗如下:“清晨闻叩门”一诗是组诗《饮酒》十二首其九,描写诗人隐居山林时与田父共饮之欢;“栖栖失群鸟”一诗是《饮酒》其四,表达诗人离群索居之孤独与宁可孤独亦要守志其所的决心;“昔欲居南村”一诗是组诗《移居》其一,抒写诗人潜居野村陋宅之乐;“春秋多佳日”一诗是《移居》其二,亦述隐居生活中诗酒耕读之趣。黄庭坚在嘉会亭刻下这四首陶诗明显透露出他精神世界的另一面,虽然不能在自己的诗歌当中表白隐逸情怀,但是借助陶诗他的情感最终得到了抒发。

其实浯溪地方书写当中,以隐逸为主题的诗歌并不少见,然而大多只是应了浯溪的虚景,不似秦观、黄庭坚是在阅尽朝堂险诈、沉潜苦闷之后表达出对生命自由的渴望。也正是因为他们将自己的真实身世融入到隐逸这一传统主题当中,无论是自我创作还是对

前人作品的发明，都使得他们的“思隐”迸发出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三、新主题的崛起：史评新声 引发激烈争论

黄庭坚在浯溪所作之诗是《书磨崖碑后》，此诗刻石，今仍可见。诗为七古，前有长序，后有两则刻者跋语，是黄庭坚诸多浯溪题刻当中影响最大的作品，也是浯溪宋碑中最重要的作品。以下是石刻原文：

崇宁三年三月己卯，风雨中来泊浯溪。进士陶豫、李格，僧伯新、道遵同至《中兴颂》崖下。明日，居士蒋大年、石君豫，太医成叔及其侄逸，僧守能、志观、德清、义明等众俱来。又明日，萧褒及其弟褒来。三日徘徊崖次，请余赋诗。老矣，不能为文，偶作数语。惜秦少游已下世，不得此妙墨刻之崖石耳。

春风吹船着浯溪，扶藜上读《中兴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鬓成丝。明皇不作苞桑计，颠倒四海由禄儿。九庙不守乘舆西，万官已作鸟择栖。抚军监国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为？事有至难天幸尔，上皇躅躅还京师。内间张后色可否，外间李父颐指挥。南内凄凉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臣结春秋二三策，臣甫低头杜鹃诗。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瑶词。同来野僧六七辈，亦有文士相追随。断崖苍藓对立久，冻雨为洗前朝悲。

宋豫章黄庭坚，字鲁直。诸子从行：相、税、枳、桔。春陵尼悟超同来相观，南阳何安中得之，祁阳令陆弁景庄，浯溪伯新，宣和庚子十二月廿日书。无诸释可环模刻。

康熙癸丑仲冬月祁阳令曲安王颐重修刊。邑庠生蒋善苏监修，沁水张谿题“涪翁此诗作于崇宁三年三月，未及上石，稿藏子发秀才家，乃以私钱刻之中兴碑侧”。^[11](卷九十六)

此诗上石之后，影响很大，后人将之与《大唐中兴颂》碑对举，称为“小磨崖”。诗以批评立论，认为元结颂有讽谕玄、肃二宗的微言大义，观点新颖，发人深省。对于唐朝乱事，黄庭坚将责任直接归于唐明皇，与前人主要将罪责归于杨贵妃与安禄山迥然不同。诗歌评史从第四句始，认为是唐明皇作为一国之君不能居安思危，轻信安禄山，任其不顾礼法胡作非为，由此招致大患出奔西蜀，百官或忠或叛，天下一片乱象。“抚军监国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为”两句更是振聋发聩，直接谴责太子，太子之职本是监国平叛，他却趁机擅登大位，后虽收复两京，有功于恢复宗庙，但仍然难掩其自行取国之大逆不道。之后六句写成为

太上皇的玄宗回宫之后尽量谨小慎微仍不免狼狈不堪的生活状态，从侧面加深了对窃国者肃宗的谴责。元结作《大唐中兴颂》在前人看来是对肃宗复国功劳的称颂，然而黄庭坚却认为世人并未看懂元结的微言大义，谓元结与杜甫作为忠臣对肃宗的窃国行径恨之入骨，而世人却只知欣赏他们诗颂当中的华言丽语，读不懂隐藏在文辞背后的真意。

对于肃宗自行登基这一历史事件，浯溪崖壁前代议者皆持肃宗复国有功之论，而避谈其他。从元结自身来看，其写作《大唐中兴颂》之先或沉沦下僚或隐居不仕，直至乾元二年(759)受肃宗召得官，上元元年(760)史思明南犯，元结屯兵据险于泌阳，“全十五城，以讨贼功迁监察御史里行”。同年九月，肃宗进元结为水部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史，佐吕諲府，为荆南节度使判官，“将荆南之兵镇于九江”。上元二年(761)，历时七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基本结束。在这场动乱当中，元结表现卓绝，将才也得到全面彰显，故而意气风发，乘兴写下《大唐中兴颂》。从肃宗一度重用元结，使其才能有有用武之地、尽忠之心得到反馈的事实来看，在国乱稍平之时，元结不太可能对肃宗发出批评之声。而从其《大唐中兴颂》的内容来看，亦难见黄庭坚所谓之意。

因为山谷史论极具话题性与争议性，故而其诗一出，议者纷纭，文人骚客在浯溪各骋其辞，莫衷一是，浯溪书写的主题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对元结颂文是否真的语涉讥讽的讨论瞬间占据了浯溪话题榜的榜首，其他三大传统主题反倒稍稍逊色。南宋钟兴嗣《浯溪诗》序有言直陈：“兴嗣暂寓浯溪，得观古今碑刻，往往议论互相矛盾，其端皆由黄太史之诗而起。”^[12](第十八卷)范成大《骞鸾录》亦称：“鲁直既倡此论，继作者靡然从之，不复问歌颂中兴，但以诋骂肃宗为谈柄。”^[13](5929)

论者当中名家辈出，单就宋代而言，张孝祥《浯溪有感》谓玄宗“三郎归来长庆楼”，肃宗“中兴之功不赎罪”^[14](8)，对太子窃国的指责直接而激愤；而李清照的《读中兴碑和张文潜韵》二首虽是次韵张耒诗歌，持论却明显与黄庭坚相近，对玄宗、肃宗予以辛辣批评。持反对意见者如范成大诗刻《书浯溪中兴碑后》，其序辩称“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而众人发明元结颂中之讥讽意，使得“磨崖之碑乃一罪案，何颂之有？”因此诗曰“纷纷健笔刚题破，从此磨崖不是碑”，^[15](171)反应激烈异常，对以《大唐中兴颂》为讽言的众人提出诘问。因为物理条件的限制，范成大不方便在刻石上作长篇大论，但因对此事的热切关注，之后更在《骞鸾录》中详细地补充阐述了他的观点：

善恶自有史册,歌颂之体不当含讥,譬如上寿父母之前,捧觞善颂而已,若父母有阙遗,非奉觞时可及。磨崖颂大业,岂非奉觞时邪?元子即不能无误,而诸人又从傍诋诃之不怨,何异执兵以诟人之父母于其子孙为寿之时者乎?乌得为事体之正?余不佞,题五十六字于浯溪上,殆欲正君臣父子之大纲与夫颂诗形容之本旨。^{[13](5929)}

范成大对黄庭坚等人认为《中兴颂》语涉讥讷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对立意见,他主要从“颂”文体特点的角度来进行批驳,而其以正君臣父子之纲为自己张目,义正辞严,与其他诗人即兴书崖的诗歌相比更见郑重,同时也将这个话题的讨论提升到一个社会道德秩序的高度,再次深化了这一主题的文化内涵。这种论辩的激烈程度与深度是浯溪原有的三大主题所无法呈现的,可以说黄庭坚的史论主题重新激活了浯溪的书写热度。

四、公共主题之外:诗人内部的情感关联

苏门中人遭受贬黜的政治背景基本相同。从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开始,苏门文人作为旧党外贬,一直延续到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党禁得以完全解除,这场惨剧共持续了三十五年之久。在这场几乎等不到尽头的大迫害中,苏门中人是朝廷重点打击的对象,这决定了他们的后半生注定要生活在颠沛流离当中,直至生命耗尽。在各安天涯的贬谪生活当中,朋友之间的惺惺相惜和在苦难之中的相互认同可以说是他们的止痛良药。

先以秦观和张耒为例,横遭再贬的秦观在浯溪瞻仰中兴碑时思念同门友人张耒,并从张耒的诗歌当中找到了舒解内心压力的语言密码。据前文对张耒诗歌的分析,可以确定的是《读中兴颂》一诗在线索的曲折和情绪的怅惘上与秦观此时呈现出来的人格气质是很吻合的,而这首诗所表现出来的人生的大起大落与历史的沧桑悲凉又恰恰符合了秦观的心理表达期待,因此,秦观选择好友张耒这首能完全剖白其心意的诗歌题写上石。其中包含的深层意义是秦观对张耒的绝对认同,是二人在史事见解上的契合,在诗歌所言之“志”上的统一。如斯种种,若非知己,实难达到。

多年之后,黄庭坚在谪经浯溪之时也忆及苏门好友,张耒的诗歌、秦观的书法、苏轼的境界无一不引起黄庭坚的追怀。崇宁三年(1104),苏子已逝,四学士中晁补之与秦观也已然谢世,张耒奉祠闲居,黄庭坚晚年远谪,此时在浯溪读到张耒撰、秦观书的《读

中兴颂碑》,即便淡然超逸如山谷亦不免深感同门之凋零、晚境之颓唐。因此他在《读磨崖碑后》诗序中无限怅惘地叹息“惜秦少游已下世,不得此妙墨刻之崖石耳”。数载之前,张耒以中兴碑为题赋诗,尚得秦观挥毫题壁;经年之后,黄庭坚同样以中兴碑为题赋诗,与秦观却已是天上人间。这其中的深憾,非同门厚谊,何以体味?

不过,如果说黄庭坚在忆及秦观时心中充满了伤悼的话,那么对亦师亦友的苏轼的追怀则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慰藉。黄庭坚在浯溪嘉会亭刻下陶渊明四首诗歌,其中第一首“清晨闻叩门”颇有来历。绍圣二年(1095),苏轼被贬广东惠州安置时曾以大字书写此诗自勉。崇宁三年(1104),苏轼已离世三载,黄庭坚在赴广西宜州贬所途中以草书上石了同一首诗,此时,他所要表达的无非是对苏轼这位人生知己、精神导师的认同与追念。此诗云: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褰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已诤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16](89)}

众所周知,苏轼是历史上第一个大张旗鼓地学陶诗、和陶诗的大诗人。苏轼书写此诗,不仅是出自对陶诗艺术风格的钟爱,更是对陶渊明冲淡平和、处俗怀真的完美人格的膜拜,而陶渊明其人其诗实则是苏轼谪居期间的灵魂伴侣、导师。黄庭坚诗论尊杜,学陶不似苏轼那般广为人知,但事实上“黄庭坚对陶渊明的景仰和学习贯穿其整个人生”,“至其晚年,黄庭坚对陶诗更是情有独钟”^[17]。其《跋子瞻和陶诗》曰:

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18](604)}

在黄庭坚看来,苏轼与陶渊明一样具有超然豁达的胸怀。所以说此时黄庭坚在浯溪写下《饮酒》其九一诗首先是出于对苏轼的追怀与承继。黄庭坚一生的坎坷遭遇实与受苏轼牵连不无关系,然而即便如此,他对苏轼的追随与感念仍是矢志不渝的。故谓君子之交,于患难当中最可见得。

除此之外,黄庭坚的《书磨崖碑后》最末两句,“断崖苍藓对立久,冻雨为洗前朝悲”,与早前苏轼《游三游洞》“冻雨霏霏半成雪,游人屐冷苍崖滑”^{[19](46)}两句造语、意境颇为相似,而情感更为沉郁,明显与离世多年的苏轼形成诗意的对话,其中厚谊,感人至深。

“友情”并非浯溪书写当中的重要主题,在苏门

文人之前与之后都没有出现过，但是黄庭坚、秦观、张耒以及苏轼诸人的深挚友谊却在浯溪留题当中很自然地体现出来，甚至这种师友之间的深情厚谊伴随着秦观和黄庭坚整个浯溪书写过程。所以说“友情”是苏门中人在浯溪特有的内部书写主题，而冰冷的崖刻也因为这种饱含深情的书写平添了温暖的人间情味。

浯溪本“世无名称者也”，它的诗歌主题只可能是单纯的景物而已，直至元结的命名与铭颂刻石，赋予了它鲜活的文化生命，使它的生命主题变得多元。而这种多元并非静止的，历代文人在体会、阐释其文化内涵时，又赋予它新的内涵，文人书写浯溪的过程即是浯溪文化生命成长的过程。黄庭坚、秦观、张耒诸人的题咏，是对浯溪传统主题的阐发，亦是对新主题的开创。

参考文献：

- [1] 陆增祥. 八琼室金石补正[M]. 吴兴刘氏希古楼刊本, 1925.
- [2] 胡仔.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笔记小说大观[M]. 扬州: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3.
- [3] 秦镛. 淮海先生年谱[M]. 嘉庆刻本.
- [4] 秦观. 淮海集笺注[M]. 徐培均笺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 [5] 元结. 元次山集[M]. 孙望校. 上海: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60.
- [6] 脱脱.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7] 黄庭坚. 黄庭坚全集[M]. 刘琳等校点.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
- [8] 王明清. 挥麈后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 [9] 欧阳修.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10] 颜真卿. 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表墓碑铭[C]// 孙望. 元次山年谱. 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 [11] 王昶. 金石萃编[M]. 嘉庆十年刻同治钱宝传等补修本.
- [12] 吕恩湛. 宗绩辰. 永州府志[M]. 清道光八年刊本.
- [13] 吴文治. 宋诗话全编[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 [14] 张孝祥. 于湖居士文集[M]. 徐鹏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 [15] 范成大. 范石湖集[M]. 富寿荪标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 [16] 陶渊明. 陶渊明集校注[M]. 孙均锡校注.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6.
- [17] 郑永晓. 论黄庭坚学陶诗[J]. 文学遗产, 2006(4): 45-50.
- [18] 黄庭坚. 黄庭坚诗集注[M]. 任渊等注. 刘尚荣校点.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 [19] 苏轼. 苏试诗集[M]. 孔凡礼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Multiple themes in the topographical writings: A case study of Wuxi writings by Su Shi's disciples

PENG Min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Yongzhou 425000, China)

Abstract: Su Shi's disciples including Zhang Lei, Qin Guan and Huang Tingjian once wrote one by one about Wuxi, Yongzhou in Hunan, hence presenting jointly the multiple themes of Wuxi writing. Firstly, their writings expressed such classical themes as loyalty, morality, cherishing the past and seclusio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stilling their demotion into the writing. Among these writings, Huang Tingjian ushered a new voice of criticizing at history in his *After the Inscription on the Cliff*, believing that Yuan Jie was ironical in *the Ode to Tang's Revival*. Thus, Huang evoked heated debate among critics of later generations, which started a new theme in Wuxi writing. Besides, Su Shi's disciples did not write at the same time, but their writings were interrelated and expressed the same feeling between the teacher and the disciples, which became a special internal theme of "friendship" among Su Shi's disciples.

Key Words: Wuxi; stone inscription; Huang Tingjian; Qin Guan; Zhang lei

[编辑：胡兴华]